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沙特阿拉伯 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

• 章 远 刘林漳

[内容提要] 弱化教派主义是学界研究“沙特式”改革开放新航向的一项重要议题。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解读学界关于沙特弱化教派主义的国内政策，探讨沙特阿拉伯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在中东地区力量格局多元平衡的复杂背景下，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基本逻辑。自2019年以来，沙特致力于通过构建政治互信、深化经济交流、聚焦防务合作和推动文明对话牵引教派政策由二元对立的理念架构向融合共生的执行范式转换。尽管伊斯兰世界内部有关弱化教派主义的战略共识及区域联动存在“温差”，且受到美国等域外大国权势的惯性影响，但在矫正国家教派博弈、破解中东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以及丰富“全球南方”地区治理观时代内涵等方面仍产生重要影响，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东和平的治理困境变化和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BGJ078）的阶段性成果。

为中东地区教派和谐对话和伊斯兰世界团结发展增添更多动力和希望。

[关键词] 沙特阿拉伯 弱化教派主义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外交调整

2017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正式成为沙特王储以来，积极探索回归“温和伊斯兰”，摆脱逊尼派和什叶派敌意螺旋（Hostility Spiral）^①的对外宗教政策，并在2019年阿美石油公司遇袭后，大规模推行以“温和原则”和“净化教派对立思想”为内核的改革措施，缓解同国内外什叶派宗教政治力量的对立情绪。^②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两个长期对抗的中东地区大国克服历史和心理等层面的矛盾对抗障碍实现“世纪和解”，并在新一轮中东“和解潮”中取得对话合作的实质性进展，这与沙特在伊斯兰文化圈重塑教派主义话语叙事剧本有着密切关系，这既是以往激烈教派对立政策从高潮到回落的表征，也反映出沙特对教派问题的威胁认知与弱化教派主义的行为策略正发生着积极变化，合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态势，在夯实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的基础上，为充满不确定性和极度分裂的世界传递更多和平和解的希望与信心。

① 敌意螺旋（Hostility Spiral）是国际关系范畴的一个概念，它描述了一种国家间关系的动态，意指双方的敌意和对抗行为逐渐升级，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甚至可能引发冲突或战争。这种螺旋形成升级过程通常是由于误解、不信任、安全困境和报复行为等因素导致。相关阐述参见：Stephan Wagner, “Hostile Spiral and 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3 (2021), p. 96。

② 唐志超：《由极端到温和：沙特宗教变革及其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4期，第110—125页。

在中东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沙特弱化教派主义^①外交调整的研究仍有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现有研究基本沿用了学界探讨国家政教关系演变的原因论和阶段论等基本框架。有学者指出，沙特试图以政府强力支持为依托，借助长期性和针对性的纲领主张削弱教派因素在国内政治和地区外交中的作用，更好适应国家转型愿景深耕发展的需要。^② 有专门梳理沙特自中东变局以来不同时期在教派问题上的政策转向，大致可归纳为寻求安全、谨慎低调的防御现实主义阶段，形塑权威、激进主动的进攻现实主义阶段，以及平衡利益、温和渐进的动态新现实主义阶段，并认为在动态新现实主义阶段，沙特对什叶派采取了两面均衡的对冲策略，既试图制衡什叶派，又试图与什叶派接触，目的在于管控逊尼派与什叶派因互不信任的刻意放大与政治化操弄而产生的阵营对抗与恶性竞争。^③

相关讨论还直接延续了 21 世纪初“伊斯兰教外交”领域学者建构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中的“差异化身份认同塑造多面相教派政策”的理论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沙特优先”的新民族主义重塑国民身份认同，进而影响教派政策目标定位、竞争意义和功能变化的分析中。例如，有学者解析新民族主义叙事影响沙特新温和形象国际传播的内在作用机制，认

① 综合学界对“弱化教派主义”概念的多维解读，本文认为“弱化教派主义”的底层逻辑和初始意义应被阐释为以弥合宗教内部分化为目标，以教派威胁去安全化和教派身份去政治化为核心政策主张的理性教派叙事策略。就沙特而言，弱化教派主义意味着理性看待教派矛盾与冲突，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分歧对峙和利益争端引发的诸多教派问题移出紧急事件状态，转而将其置于一般性政治商谈的去事件化进程。参见 Azmi Bishara, *Sectarianism without Sec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46–59。

② Jeremy Diodor, “Iran, Saudi Arabia and the Power Struggle over Muslimness: Reification, Securit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33, No. 1 (2024), pp. 63–84.

③ Stella Arthur, “From ‘Soft’ to ‘Hard’ to ‘Moderate’: Islam in the Dilemmas of Post-2011 Saudi Foreign Policy,” *Relations*, Vol. 11, No. 4 (2020), p. 211.

为王储自上而下倡议以“沙特人的沙特”“沙特优先”和“让沙特伟大”等概念强化国家的民族认同感，将社会大众整合成一个超越“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沙特人”群体，宣传宗教温和、现代化进步的新国家形象。^① 类似的解释逻辑，一些研究者认为沙特正培育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回归温和伊斯兰路线，为“后瓦哈比主义”时代重置教派政策的接触对话功能提供更多可资回旋的舞台。^② 部分学者还采用“前景理论”来评估弱化教派主义政策与巴林、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缘政治博弈需求之间的契合度，认为中东地区的教派问题根深蒂固，并且与多个国家的转型发展目标相互交织。据此，他们指出沙特阿拉伯在推动教派主义政策弱化的过程中可能遭遇持续动力不足的挑战。^③

综上，学界关于沙特弱化教派主义的观点大致如下。其一，沙特弱化教派主义有明显的内在动因，即弱化教派主义并非民间宗教人士自下而上发起的“草根运动”，而是为了降低国内外对改革措施的抵触，并支持“2030 愿景”的深入实施和功能性目标的实现。其二，沙特在中东变局以来教派政策表现出从

① Madawi Al-Rasheed, *The Son King: Reform and Repr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83–232.

② Alhussein Eman, “Saudi Arabia Champions ‘Moderate Islam’: Underpinning Reform Efforts,” *The AGSIW Journal*, Vol. 2, No. 5 (2020), pp. 79–91; Yasmin Farouk, “Saudi Arabia’s Religious Reforms Are Touching Nothing but Changing Everything,”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 Vol. 7, No. 2 (2021), pp. 283–299; Smith Kristen, “Saudi Arabia’s New 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The AGSIW Journal*, Vol. 3, No. 10 (2022), pp. 310–327.

③ Omar Shehabi, *Contested Modernity: Sectarianism,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Bahrain* (London: One World Academic Press, 2019), p. 274; Yusri Haran, “The Origins of Sectarianism in Egypt and the Fertile Crescent,”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1 (2019), pp. 29–49; Samer Baker, “Sectarianism, Indiscriminate Violence and Displacement in the Syrian Regime’s Civil War Strategy,” *Conflict,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24, No. 2 (2024), p. 18.

“软”到“硬”再到“温和”的周期性转变规律，并投射到国家不同时期的外事活动之中。其三，沙特教派政策内涵的变迁借助了新民族主义和温和伊斯兰的“国族－宗教”双重话语叙事，进而赋予“弱化”手段更多法理支持，但“弱化”理念及其实践能否逻辑自洽的长期执行仍然需要时间去验证。

上述情况表明，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涵盖了国内政策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尽管如此，目前在深入探讨地区外交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并缺乏深入的理论框架和视角。鉴于此，本文在整理和分析相关英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文献的基础上，借鉴“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框架，探讨沙特阿拉伯在外交政策中弱化教派主义倾向的基本逻辑。文章首先分析了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的动因，然后通过考察其在不同层面的具体措施，探讨了影响这些措施有效实施的因素。最后，本文评估了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理念及其执行的客观成效。

一、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理论阐释

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以下简称 CAS）理论为研究国际政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它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沙特阿拉伯如何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在中东地区的行为和决策。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我们能够剖析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原理和机制，从而为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论洞见。

（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核心内涵

复杂适应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适应性主体组成的系统，这些主体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和与其他主体的交互作用来改变自身的行为规则，以适应环境并实现目标。^① CAS 理论的最基本概念是适应性主体（Adaptive Agent），亦称为智能个体（Intelligent Individual）。这些个体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能够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调整自己的思维结构和行为模式。它们能够与外部环境及其他主体进行互动，从而展现出智能性主动适应行为。

CAS 理论在探讨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演变时，基于三个核心立场：首先，国际政治系统被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实体，其行为和结构随时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次，系统中的国家作为主动的、有目的的适应性主体，能够根据自身目标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主动学习和适应，进而调整其行为和政策。最后，这些适应性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演化的关键驱动力，它们之间的合作、竞争和冲突等互动不仅塑造了国际政治的格局，也推动了整个系统的进化。这种分析框架强调了国家行为的灵活性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揭示了国家在动态的国际政治系统中如何通过自我调整和策略转换来维护和追求自身利益。^② 它突出了国家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

①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由美国学者约翰·霍兰（John Holland）在圣塔菲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之际提出，该理论为学界理解 and 研究复杂系统的行为、结构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参见 John Holl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Daedalus*, Vol. 121, No. 1 (1992), pp. 17–30.

② 相关研究有：史诺德（Ike Snider）和谢林（Poly-Sherin）的系统进化稳定论，杰维斯（Simone Gervais）的系统正负反馈理论，罗施瑙（Philip Rosenau）的复杂系统“湍流范式”理论等。

和学习机制，以及在多维度、多层次的互动中如何重塑国际关系。

由于国家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和非线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预测沙特外交政策调整的未来走向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CAS 理论仍然试图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来理解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动态过程和影响，深入探究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 CAS 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分析沙特阿拉伯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在国际政治系统中的行为表现，以及这种表现如何影响沙特自身的利益和地位。同时，我们也可以探讨沙特外交政策调整对中东和整个国际政治系统演变和进化的影响。

（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适用性

一方面，中东地区是一个由各类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复杂的政治系统。首先，中东地区包含了多个民族、宗教和教派，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往往导致地区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其次，中东地区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外交关系和地缘政治竞争。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敌对关系和领土争端。此外，中东地区还面临着多种安全威胁和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这些安全威胁不仅对中东地区的国家构成威胁，也对全球安全构成了挑战。中东地区的政治系统还受到外部势力和国际干预的影响。一些大国，如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在中东地区有着重要的利益和影响力。它们通过军事干预、外交斡旋、经济援助等方式影响中东地区的政治动态，使得地区的政治格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在中东这个充满挑战的政治系统中，展现出作为一个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的重要特征。其外交政策

的调整反映了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学习能力，它通过观察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从中吸取教训并积累经验，以便更好地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同时，沙特阿拉伯也展现出灵活性，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和自身国家利益的演变，灵活调整其外交政策和战略。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国际政治系统中与其他国家和外部环境进行持续的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不仅影响着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也是中东地区政治系统演化的关键驱动力。通过这些特征，沙特阿拉伯能够在复杂的中东政治系统中维护自身利益，并塑造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综合来看，CAS 理论为分析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视角下，沙特阿拉伯被视为一个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在中东地区这个复杂适应系统中，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环境进行交互作用。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政策调整是其适应地区局势和国际环境变化的一种表现，它通过这种交互作用来“学习”和“积累经验”，进而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① 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不仅是其作为一个适应性主体在中东政治系统中的行为表现，也是整个国际政治系统演变或进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沙特弱化教派主义行动和政策的调整可能会促进新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出现，影响中东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通过 CAS 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动因、举措和制约因素，以及这种调整对沙特自身利益、国际政治系统演变和进化的意义。

① Stephen Lans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2, No. 2 (2020), pp. 183–204.

二、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动因

沙特作为中东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适应性主体，能够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回归低调而温和的教派政策。为了避免与中东地区的各种什叶派宗教政治势力关系进一步恶化，沙特将这一关切纳入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并作为长远规划的一部分。沙特逐渐减少使用教派对立的叙事方式来加剧政治博弈和文明冲突，这主要是受到以下内外部动因的影响。

（一）激烈外交抉择加剧国家战略透支可能性

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激进式、高烈度的外交战略抉择会增大国家遭遇战略透支困境的可能性。^① 具体而言，采取激进战略的国家会对地区秩序动态平衡形成较大冲击力，并因其影响到他国核心及次核心利益导致本国面临外部压力超越自身承受能力，陷入战略透支不断恶化进而逆转国家发展势头的地缘政治风险。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世界的群体性动荡和伊朗大国思想的复苏加剧了沙特对地区宗教安全格局失衡和国家政权稳定性不足的焦虑。为有效防止伊朗与中东地区逐渐崛起的什叶派力量合谋颠覆王室统治，沙特采取激进式的区域外交战略，以强烈的教派话语叙事放大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争端，刻意引导地区国家对伊朗形成共同的教派威胁认知，密织反什叶派阵营联盟，并不断将教派政治博弈实质化，从而遏制伊朗

^① 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51—83页。

在海湾地区的扩张，维护地区主导权和教派生态平衡。

激进的外交策略直接加剧沙特外交转型的目标偏移现象，还间接制约沙特止损行为的出现，最终导致沙特在战略透支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随着伊朗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迅速提升，沙特认准伊朗有意愿且有能力改变海湾地区政治格局和宗教生态平衡，因此，沙特加快对以海合会成员国为主体的反波斯和反什叶派联盟体系进行内向性的目标一体化整合与外向性的结构“小多边化”^①延伸。沙特通过渲染“什叶派崛起威胁”和“逊尼派受害姿态”制造安全焦虑，将联盟的目标统合为“抗衡伊朗及其扶植的什叶派力量”，并强加于盟友的外事活动议程。同时，沙特在加强与科威特等重点盟友双边运作的基础上，通过“GCC+”组织模式扩充海合会成员国，积极拉拢约旦和摩洛哥等域外盟国介入同伊朗的地区性竞争，致力实现次区域、小多边的安全架构联动。另一方面，由于教派主义政策具有一定动员成本低、政治利益回报高的优势，沙特王室惯于有意识地忽视激进外交手段的负面反馈信息。从也门军事干预到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代理人战争，沙特陷入“赢不了、输不起、走不成”的尴尬处境。为了维护政府的威望和信誉，沙特当局不得已继续坚持教派博弈的“多线战斗”，间接或采取升级行动，这些举措影响沙特难以有效实施理性的止损策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财政回旋空间的大幅挤压给王室政权的稳定延续带来巨大压力。

（二）中东多元格局趋于平衡营造地区有利环境

一方面，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②的中东安全

① Shahram Akbarzadeh, "Sectarianism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Vol. 9, No. 1 (2021), pp. 76–93.

②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

新架构和求同存异的和平外交理念，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用增强，并成为推动沙特同伊朗等什叶派宗教政治力量关系缓和的主引擎。中国不谋求地缘政治私利，坚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长远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给予中东国家明确有力的支持，长期开展良好务实的多领域合作，反对以教派身份标签和教派阵营对垒为依据处理中东教派矛盾和国际关系，抵制西方政客低级捏造的教派冲突假新闻和后真相。中东国家也欢迎中国持续深入中东，并反对西方媒体频繁炒作的中国“培养代理人”“填补权力真空”以及“划设势力范围”等霸权话语叙事，继续坚持伙伴定位，增进战略互信，促进地区安定与繁荣。

另一方面，全球政治民主化和多极化发展的积极趋势加快中东国家主动塑造地区和平议程，推动和解潮升温、冲突潮降级和发展潮勃兴的战略自主步伐。中东的战略自主以维护安全为开端，以聚焦发展为主线，逐步向各个领域扩展，在重振民族独立信心，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以及增强地缘政治格局多元平衡等方面具有强大的正向延展效应。此外，美国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中东政界逐渐产生对美信任危机，“去美”“离美”趋势进一步加强，愈多边缘化或半边缘化的中东国家开始寻求地区事务话语权，并试图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区域发展模式，适应自身内促改革、外寻缓和的发展需求，优化安全治理、经济转型和教派争端的综合施策环境，为和平对话注入更多独立元素和内在驱动力。

（三）西方国家分裂加剧与伊斯兰世界温和共存形成鲜明对比

在大国博弈复杂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西方

国家政治极化趋势愈发显著，政治碎片化逐渐成为新常态^①。经济不平等持续加剧，民粹主义强势崛起，身份政治深度泛滥等民主乱象的多重症结导致美西方国家政治光谱由相较稳定的橄榄球型结构向两极分化式的哑铃型和 U 字型双峰格局的转变趋势明显增强，为斗而斗的政党博弈色彩愈加浓厚，对抗性制度体系的紊乱失序引发治理能力退化和社会撕裂愈演愈烈。这既是新自由主义陷入有效性危机和民主质量持续倒退的现实镜像，同时也对国际秩序造成严重负面外溢性影响，给世界稳定发展带来诸多不可预测性和不安全感。

然而，在伊斯兰世界，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中东国家致力于突破“新冷战”思维框架，从构建差异转向推动融合，给和平发展充分的资源配置空间，以此抵制教派矛盾的安全化竞赛和拉帮结派的教派政治战，约束激进势力任意将教派问题上升为宗教安全议题的极端化行为，减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以弱化教派主义的文明交互思维指导社会发展实践，以宽容和解的姿态拓宽中东各国温和共存的空间，以对话谈判的方式为解决世界热点问题提供希望和指引。在极度分裂的世界中，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战略尝试力量式微，并不断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蓄意挑战，但这种寻找和平和解光明的进步力量为国际秩序稳定增添更多正能量，对推动世界发展繁荣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① 郑春荣：《欧洲政治碎片化与中欧关系走向》，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6期，第32—38页。

三、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举措

沙特阿拉伯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是基于对过去冲突与合作的评估、对地区格局新发展趋势的感知以及对域外大国行为的观察，主动调适自身外交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结果。这种调整主要包括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明对话等议题层面主动降低教派冲突及其外溢影响的威胁认知度，停止炒作“什叶派威胁论”，重新调整什叶派身份定位，弱化什叶派的“他者”身份，加大资源配置的力度、维度与深度促进同伊朗等什叶派政治力量的各类合作。

（一）构建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是沙特和伊朗和解合作的首要利益诉求。沙特和伊朗的竞争现实不容回避且是一种长期趋势，但在政治上建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互信关系顺应两国联系空前广泛和世界整合趋势加快的客观形势。2023年3月，沙特开始恢复同伊朗的外交关系，重新开放伊朗大使馆，再次激活双方各类合作协定。^①此后，两国内政和外交部门的高层官员以各种灵活方式围绕沙特国内的什叶派问题、变化中的伊核问题、黎巴嫩政局和叙利亚内战等中东核心问题频繁进行政治对话。作为两个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在政治领域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不应成为相互消耗的制度性对手，正如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所说，海湾地区容得下两国

^① [沙特] 艾曼·阿布·阿巴赫：《王储殿下就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发表积极看法》（阿拉伯文），载《利雅得报》2023年4月1日。

各自发展和共同繁荣，重塑政治互信的意义早已超出双边，影响全球。^①

为防范地区竞争异化为教派斗争，沙特还提出在两国间设立管控教派冲突的“护栏机制”（Guardrail Mechanism），避免以教派冲突叙事的危险方式定义和影响双边政治友好交往。“护栏”构想旨在降低教派冲突上升为国家非常规议题的可能性，抑制“先定义后理解”的教派斗争惯性思维及对抗冲动，牵引塑造更高层次，更具战略性的信任关系，跳出西方国家人为编织的“逊尼派－什叶派势必敌对”的宿命论陷阱。^② 下一阶段，沙特需与伊朗进行竞合领域的细分，进而各自负起切实责任加固“护栏”，解决好双方地区博弈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推动实现弱化对立，增进互信的目标与手段平衡，探索“互不制造对抗、互为发展机遇”的合作之道，为嗣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转圜做铺垫。

沙特对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遇难后的正面回应进一步提升了两国政治互信的韧性和发展水平。莱希总统遇难消息确认后，沙特国王和王储立即向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穆赫贝尔（Mohammad Mokhber）致唁电，对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秘书长贾西姆·巴达维（Jassim Badawi）也在第一时间同伊朗代理外长阿里·巴戈立（Ali Bagoli）通电，就莱希总统及随行人员的罹难表示哀悼，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更是亲自赴往德黑兰参加莱希总统的葬礼，表示“沙特会继续巩固同伊朗的政治友好关系，并愿向伊朗提供一

① [沙特] 艾曼·阿布·阿巴赫：《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高度重视与伊朗的政治对话》（阿拉伯文），载《利雅得报》2020年7月13日。

② Marius Linge, “Sunni – Shia Identities Among Young Muslims: the Remaking of Islamic Bounda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Vol. 37, No. 2 (2022), pp. 261 – 278.

切必要帮助和支持。”^① 沙特在伊朗出现意外变局时采取的积极做法有利于两国增进政治互信，也体现了沙特坚定推进对外友好合作的决心。

（二）深化经济交流

深化同伊朗的经济合作是沙特弱化教派主义的关键重点。增强本国经济自主、重构海湾经济地图、抗衡美国滥施金融霸权的新形势使得沙特与伊朗的经济合作需求越发旺盛。在自由贸易方面，“经济繁荣骨架项目”（EPSP）成为回应美国借助“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裹挟西方盟友反向赋能海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方案。EPSP 自提出并推动实施以来，为促进沙伊两国经济合作增添新动力，拓展新空间。^② 2023 年 6 月，沙特外交大臣就曾表示，希望能够尽快打破同伊朗的贸易壁垒，互派贸易和经济代表团，加强两国经济知识和技术方面的互动，构建复合型圈层嵌套的经济生态网络，提高协同制衡美国“拉拢式”经济布展中东的应对能力。

在能源金融方面，美国不负责任的“大水漫灌式”货币政策加剧中东多国能源危机、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金融乱象，美元“武器化”的外部昭示促使沙特和伊朗积极探索“去美元化”路径。海外多家媒体报道，2024 年沙特将不再续签以美元作为石油

① “Saudi Foreign Minister Faisal Travels to Tehran for President Leahy’s Funeral,” *Saudi Press Agency*, May. 25, 2024. <https://www.spa.gov.sa/2024/05/25/world/asia/politics/G753419>（上网时间：2024 年 6 月 22 日）。

② “经济繁荣骨架项目”是 2023 年 10 月沙特牵头与伊朗共同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标准倡议，涉及贸易交流、能源合作和金融规划等诸多开放性协定，旨在建立公正合理的海湾地区经济秩序，推动经济领域务实合作，参见“Saudi Arabia and Iran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Initiative,” *Saudi Press Agency* May. 11, 2023. <https://www.spa.gov.sa/2023/05/11/world/asia/economic/N210901>（上网时间：2024 年 6 月 23 日）。

计价货币的“石油美元协议”(Petrodollar Agreement),标志着存续约五十年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能源金融体系发生动摇。^①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多次呼吁在能源金融中以本国货币或其他货币替代美元。2024年6月,沙特经济规划部长和伊朗经济金融事务部长承载着对建立全球能源金融新秩序的共同期许,围绕国际石油市场的未来形势、以多种货币进行大宗石油交易、加强跨国融资机制建设以及构筑区域自主金融支持体系等伊斯兰金融规划议题密集互动,并希望借助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联合把控能源金融市场,提升石化产业供应链韧性,降低能源金融领域对美国的依赖。

(三) 聚焦防务合作

与伊朗共同聚焦防务安全,瞄准实战和军工的合作关系回暖是沙特弱化教派主义的又一重要迹象。美国的战略收缩和进退失据增强了沙特和伊朗摆脱域外军事羁绊的意愿,两国通过“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跨出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一步,体现出西方霸权和中东反霸权的新型对抗。依托高水平的战略沟通平台,两国防长和外长多次开展双边会谈,旨在加强区域协调的信息化、智能化和自主化作战能力建设,提升地区防御能力和国际影响力。2023年底,针对伊朗提议的同海湾国家组建“新海军联盟”,抗衡美国军事霸权战略,为保障区域和平提供更多稳定力量,沙特国防大臣给予积极回应,“现有以美国为首的海上多国部队难以满足我们日益多样的安全化需求,组建海上安全联盟并将其拓

① “The Petrodollar Agreement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nds,” *Tasnim News Agency*, June 10, 2024. <https://www.tasnimnews.com/2024/06/10/world/saudi-arabia/economic/K109112> (上网时间:2024年6月23日。)

展为中东多边安全组织具有重要意义”。^①

也门和解的安全需求牵引着两国区域防务的合作方向。随着两国军事关系升温，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中心于2020年发起“使也门在安全上行走”的马萨姆排雷行动得到伊方第四代排雷机器人和海上排雷系统的大力支持。^② 沙特和伊朗在排雷问题上的共同协作有效清除也门本土和红海海域潜在的各种爆炸装置，降低人员触雷伤亡风险，保障航运安全，加快也门局势走出代理人军事抗衡风险外溢引发的安全困境，使也门问题的推进解决迎来更多和平转机。

此外，沙特通过深化与伊朗的军工合作将安全和防务议题从战略层级延伸至战备层面，进一步开启两国资源和技术的双向转移之门。2024年2月，沙特军事工业总局总督阿齐兹·奥哈利在第二届世界防务展（WDS）开幕式上宣布“更新与伊朗的军工合作关系”，希望通过“工业伙伴协议”鼓励与伊朗在陆、海、空、安全和空间领域的团结协作。^③ 伊朗国防工业组织相关负责人阿里·哈吉扎德（Ali Hajizad）在回应这一提议时，提出“海湾军备军工一体化”构想，并表示将通过“军备工业集团”和“特殊工业集团”两个姊妹军事公司提供制造、供应、培训、物流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支持，为下一阶段的联合军演、反恐协作和海湾稳定提供自主化、区域化、现代化三重“加速度”。

① [沙特] 图尔基·瓦西迪：《哈立德·本·萨勒曼愿意加强同伊朗的军事关系》（阿拉伯文），载《半岛报》2023年12月5日。

② [沙特] 瓦利德·卡里姆·萨克尔：《马萨姆行动将促进也门和平路线图越来越清晰》（阿拉伯文），载《欧卡兹报》2020年2月3日。

③ “The Saudi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the private sector signed multiple contracts at the 2024 World Defense Exhibition in Riyadh,” *Saudi Press Agency*, Feb. 7, 2024. <https://www.spa.gov.sa/2024/02/07/world/asia/Military-industry/F256890>（上网时间：2024年6月24日）。

（四）推动文明对话

破解和伊朗什叶派民众的交流赤字是沙特夯实弱化教派主义受众基础的潜在重要领域。沙特和伊朗虽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关注相近，在宗教、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具有广阔交流前景。自沙伊恢复外交以来，沙特伊斯兰事务部以“朝觐保障计划”（HPS）为抓手，统筹交通和物流服务委员会（TLSC）、通信、空间和技术委员会（CST）以及麦地那省发展局（MPDA）等职能部门协调联动，有序推进副朝（小型朝觐）重启、恢复。2024年4月，数十名伊朗什叶派民众前往沙特进行时隔九年的首次朝圣，并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IRNA）报道为一次“跨越教派、种族和国家界限，重温先知对全人类恩慈与怜悯的穆斯林文明对话实践。”^① 沙特放宽朝觐限制，恢复交通航班，简化入境程序等措施充分保障了什叶派人士“安全和尊重”的朝觐需求。^② 伊朗驻利雅得大使对此表示，沙特不再是“什叶派通往朝拜真主之路”的障碍制造者，并提出愿意与沙特进一步密切人文交流，共同推动伊斯兰文明发展进步。

从中东地区各类文明对话活动来看，注重机制化建设或将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主流。2024年5月，沙特文化部长在国庆艺术展的出席仪式上表示，将定期连续举办“波斯艺术里的沙特与阿拉伯半岛艺术里的伊朗”“沙特—伊朗之约：沙尘暴区域

① “Iran Starts Hajj Pilgrimage to Saudi Arabia Again,” *The 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 April 7, 2024, <https://zh.irna.ir/news/2024/04/07/saudi-arabia/hajj/T212350>（上网时间：2024年6月24日）。

② “Nine Years Later, the First Group of Iranian Pilgrims Went on a Pilgrimage to Saudi Arabia,” *Al-Monitor*, April 2, 2024, <https://www.al-monitor.com/zh-hans/originals/2024/04/zh-hans/taxonomy/term/449187>（阅读时间：2024年6月24日）。

治理青年创新设计大赛”和“璀璨波斯－沙漠绿洲”旅游推广等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人文交流活动，并设置常设合作机构为两国民众在交流互动中寻找共同语言提供稳定平台保障，建立固定联络制度加深文化交融和人民友谊，为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机遇。^① 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业部长称此举为两国新一阶段的文明对话开了好头，预示着两国的人文交流水平将进一步加深，文明认同趋向正面，助推人文合作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和正规化。

在巴以问题上，沙特和伊朗摒弃教派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教派冲突陷阱，互为缓解加沙危机，推动巴以问题解决的人道主义合作伙伴。2023年12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国际事务部主任侯赛因·阿里莫拉德（Hussein Ali Morad）通电，双方就共同向美国施压，力促加沙地带全面停火，为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达成一致。进入2024年，延宕数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使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局势达到危险低点，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Nasser Kanani）呼吁以色列停止一切对巴勒斯坦人民构成“集体惩罚”的行为，结束无休止的死亡和毁灭循环。^② 在莱希总统及随行人员遇难后，伊朗与沙特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共同支持也并未中断，两国联合派遣特别援助队持续向加沙地区提供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等人道主义援助，有效缓解加沙地区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解决作出重大努力和贡献。

① Torah Hami, "Saudi Arabia's Cultural Exchange Policy to Wards Iran: an Institutionalized Path,"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6, No. 3 (2022), pp. 227 - 243.

② [伊朗] 阿里·尼克巴赫特：《伊朗有支持巴勒斯坦问题持久解决的决心》（波斯文），载《世界报》2024年4月19日。

四、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限制

战略执行力是连接外交决策和目标实现的关键桥梁，也是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策略有效执行的综合能力。^① 对沙特而言，弱化教派主义是一种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试错的政策立场转向，只有具备一定的战略执行力，才可能团结伊斯兰世界的文明进步力量尽快走出教派博弈困境。在中东地区，沙特战略执行力的制约因素层次繁多、错综复杂，并投射到不同维度的弱化实践之中。

（一）沙特社会弱化教派主义的内向聚合力

自 1932 年沙特将瓦哈比教确立为国教后，王室便与宗教深度捆绑，并长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将什叶派视为“异端”，导致国内社会缺乏足够的弱化教派主义聚合力。一方面，沙特的宗教保守势力较为强大，遍及国家各级行政机构，除常规教派斗争手段外，更是借助数字媒体传播和渲染“什叶派是通敌伊朗的叛徒”等极具教派仇恨色彩的对立言论，希望政府能够坚守教派对立政策，严格管控什叶派的社会生存空间，拒绝同伊朗及其扶持的各类什叶派力量文明对话。沙特宗教保守势力主要是针对 2017 年王储掌权以来，温和伊斯兰思潮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扩张的影响，他们试图利用宗教保守主义对抗温和伊斯兰主义，使沙特重新回归“保守纯正”的伊斯兰社会，这在一定程

^① David Pine, "The Strategic Execution Ability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Defense and Security Analysis*, Vol. 7, No. 2 (2021), pp. 164 - 176.

度上导致国内民众弱化教派主义的认同虚化和碎片化，造成国家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事活动面临资源调配和整合功能失效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在部分沙特民众对本国宗教生态的认知里，国家的文化根基早已深刻打上瓦哈比教义教法的烙印，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交调整可能会使沙特传统宗教文化的根干暴露在“什叶派新月地带”黯然失色，进而造成国家政教关系变革和区域外交转型迷失方向。^① 尽管王储通过多种手段试图重构国族话语，但瓦哈比教派在文化认同上的凝聚力指数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准，与弱化教派主义之间存在难以绕开的巨大张力。在这种背景下，沙特社会能否以民众动员力和政治凝聚力为基底，形成弱化教派主义的强劲聚合合力仍存在不确定性。如何稳定预期，走实策略，成为沙特未来重塑国民弱化教派主义认知，提升温和外交话语权和开放包容阿拉伯国家形象的重中之重。

（二）中东伊斯兰阵营弱化教派主义的战略共识度

在伊拉克政府积极推动的五轮安全会谈中，沙特和伊朗一直在探讨弱化教派主义的可能性，目的在于将“超国家”的弱化教派主义思维落实到各国的政策框架和具体行动中。有观点认为，中东地区的伊斯兰阵营国家一贯存在乐于讨论和平对话的理念和愿景，乏于具体贯彻的信心和韧劲等双向矛盾。因此，短期内沙特和伊朗等地区宗教大国在弱化教派主义的外事活动上难以真正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政治互信与经济交流的资源配置和投入方面统筹规划尚有不少分岔口，并没有统一的指南针。此外，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不团结因素也将牵扯实现弱化

^① Chris Ferrero, "Wahhabi and the Saudi National Narrative," *Journal of Religious & Theological Information*, Vol. 19, No. 2 (2020), pp. 189-212.

目标的精力。沙特和伊朗在海湾领导权和伊核问题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并未减少，不同政治倾向的领导人对“弱化”的理解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温差，使得这一理念在具体实施时面临内涵模糊，边界宽泛，责任分配不明的困境。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深入发展和地区性的教派对抗格局加剧了穆斯林群体的利益碎片化和两大教派间的敌视度，给中东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破坏性影响。因此，淡化教派对立，聚焦发展合作成为沙特和伊朗等中东国家的普遍共识。然而，中东国家长期以来的政治失序和身份整合能力缺位，使得统治阶层以宗教身份认定国民身份进而转移利益矛盾，维护政权安全的教派身份政治化行为获得巨大生存空间和民众支持。阿曼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力量等中东什叶派群体的发展变化也使沙特长期处于安全焦虑状态，对弱化教派主义缺乏一定的信心，伊斯兰世界有关弱化教派主义的战略共识仍处于感性认知的初级阶段，内部稳定性不强。教派问题由易到难，逐步解决，弱化教派主义实现由初步认知到高级认同的实效性转化仍有许多挑战要超越。

（三）域外大国对教派政策施加影响的惯性水平

尽管影响中东事务的域外力量趋于多元平衡，但美国在中东的精准介入和长期积蓄的权势存量仍不容忽视。^①从奥巴马至拜登，美国三届政府中东政策的战略目标不断调整和战略收缩长期延续并不意味着力量衰退而放弃中东，战略收缩是美国地区决策过程中主观选择的产物，本质上符合其国家利益。将盟

① 刘中民：《权力衰落与权势存量：正视美国对中东影响的复杂性》，澎湃新闻，2023年8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403467（上网时间：2024年6月24日）。

友与敌对者分门别类，以教派对立制造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位差感”，利用教派矛盾策动阵营对抗，以此实现有限介入，居中制衡，维持地区战略信誉的政治意图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大显著特征。美国当前依然有能力主动划设排他性的教派小圈子，以对抗性叙事编排沙特处理教派争端的行为模式，打压伊斯兰世界凝聚共识，谋求最大利益公约数的新愿景。

具体而言，美国可凭借较为成熟的中东政策工具和复合多维的中东盟友体系在教派问题上实施精准投入，为教派意识形态攻势提供实质性和制度化支持。当沙特和伊朗围绕双边关系和教派问题展开多轮友好会谈后，美国通过重申安全承诺和强化轴辐式联盟建设等软硬兼施手段迫使沙特提升同伊朗的对抗强度，破坏沙伊防务合作，固化反什叶派包围圈，力图实现海湾地区宗教生态的再平衡。为维护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并深入推行“离岸平衡”政策，美国依靠权势存量放大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分裂，制约了沙特等国弱化教派主义的策略执行取得预期效果，对中东教派问题的理性解决仍具有较大的惯性消极影响。

五、沙特弱化教派主义外交调整的意义

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调整是国际政治系统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动和政策的变化有助于塑造新的国际关系模式，并对中东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尽管沙特在弱化教派主义和推动伊斯兰世界团结合作方面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挑拨和阻碍，但其做法超越了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和利己主

义，展现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应对“发生型宗教风险”^①方面的独特洞察。这种调整对于推动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及促进该地区各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矫正地区国家教派博弈，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中东变局后，沙特和伊朗都想争夺地区主导权，但都未能如愿，反而使自身国内问题越发突出。2016年沙伊断交以来，两国在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都有其各自支持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力量的对抗，进行不同程度的代理人竞争或战争，两大教派势力日益走向阵营化，加剧战略资源的消耗。沙特弱化教派主义有助于实现中东地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力量重组整合，缓和沙特和伊朗间由来已久的民族和教派矛盾，进而给地区热点问题降温。沙伊和解后，一方面促成了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的大规模换俘及安全会谈行动，使得延宕多年的也门冲突迎来转机；另一方面还为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扫除了障碍，加快缓解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和阿拉伯世界联合自主的趋势，以更加团结的力量给巴勒斯坦更有力支持从而推动巴以问题解决。^②此外，沙伊两国的异样博弈烈度减轻还促进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凝聚力及其在全球石油供应链上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有力制约美国对中东国家石油制裁的意愿与能力。

① “发生型宗教风险”是指宗教（至少在名义上）因其历史性和结构性根源成为引发暴力和冲突的力量。参见赵锦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伊朗的宗教风险研究》，载《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3期，第86—94页。

② 邹治波：《世纪和解：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的意涵与启示》，中国日报网，2023年3月15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3/15/WS6411a808a3102ada8b233c89.htm>（上网时间：2024年6月25日）。

（二）破解中东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削弱美国霸权影响

当前中东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以美国的霸权供给模式为主体，随着全球公共产品的“私物化”倾向加剧，中东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劣质化现象突出，受益方面的非排他性和使用时的非竞争性等正外部属性逐渐丧失，面临严重的“公共产品赤字”问题。美国在其主导的中东联盟体系下频繁给盟友“设计”并长期提供安全、金融和文化等领域具有霸权性质的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强化自身与中东公共产品供给间的权力关联努力塑造在该地区霸权领导的合法性基础。^① 自沙伊复交以来，双方各类合作协定重新激活，两国逐步开展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务实合作，以教派冲突管控“护栏机制”“经济繁荣骨架项目”和“新海军联盟倡议”为支撑，探索构建系统性和自主性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形成战略合力，增强战略自信，超越霸权式供给模式局限，打破“搭便车”寄生思维禁锢，抗衡美国安全威胁、经济制裁和军事蛮力等维护霸权地位的强制手段，通过多路径合作填补自主供给缺位，反对美国对中东危害颇深的霸权行径。

（三）丰富“全球南方”地区治理观时代内涵，完善全球治理

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根源在于各方势力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只有正视问题症结，停止将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填补权力真空的失范行为转嫁于教派问题，才能应对好

^① 曹德军：《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反思与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15日。

全球治理效能不彰的严峻挑战。^① 沙特弱化教派主义从政策转向到与地区什叶派宗教政治力量协调联动以破解地区安全困境、国家发展难题和教派文明冲突为目标，是落地走实全球治理观、将伊斯兰世界文明对话愿景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同频共振的有力地区实践。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支柱，沙特整合力量妥善处理教派的“同”与“异”问题不仅在于维持与中东各股什叶派政治力量的短期博弈均衡，更侧重于中长期发展与互利共赢，防范化解宗教风险叠加演变，拓展和谐共存的“伊斯兰文化”朋友圈，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公正合理化改革的自觉推动者。

结 语

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沙特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遗留的教派问题较多，教派争端很难绝迹，教派威胁压力长期存在且有条件时具备严重化的可能。在中东地区，沙特教派问题与权力政治的耦合性较其他大国更高、更直观、更复杂。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将教派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融为一体，使其共同发挥作用，进而巧借教派矛盾为各自扭曲中东文明交流体系的邪恶行为辩护，加剧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内部分裂的困境。因此，沙特作为一个具有适应性的主体，客观审视逊尼派和什叶派斗而不破博弈现象的广泛性，自觉降低教派冲突及其外溢影响的威胁认知度，采取非紧急状态下的常规性举措应对教派问题，以更

^① 刘中民：《中东：转型与冲突相互激荡》，载《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5日，第12版。

多理性企稳力量有序推进教派冲突的善后、兜底和减损补偿工作。

总体而言，沙特在外交调整上实施的是一种“适度缓和”策略，即在不动摇伊斯兰教正统性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宗教政策的现实转向，抑制教派分歧上升至国家竞争的势头，从征服控制、二元对立的冲突范式向互利包容、共生融合的和谐范式转换中探索教派间的理性行为边界，反向消除教派间的敌对紧张关系。诚然，沙特弱化教派主义的未来前景存在质疑，受到分散在伊斯兰世界各种什叶派宗教政治力量的普遍欢迎和认同还需一段时间，国家间如何界定教派冲突对政权安全的威胁程度并构建弱化教派主义的区域性政策体系还没有定论。如果不能厘清这些问题，将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延长弱化共识及其实践的生命周期，形成应对外部影响的硬核力量。探讨沙特阿拉伯在弱化教派主义方面进行外交调整的区域化和制度化策略还必须注意到与那些支持弱化教派主义且拥有执行能力的什叶派主权国家、政治组织、民间武装等行为体建立双重预防机制，观察那些可能存在的政策执行不力或以“弱化”为名，实际上却进行分裂和破坏性行为的情况。毕竟要实现跨教派敌对行动，弱化教派主义的相关政策有望成为达到“伊斯兰文化圈”和平愿景的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 钮 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 章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 赵 冰 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 涂怡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 张励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 段世磊 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 邵红峦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谢子卿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 崔财周 盐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 张 帆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 王 楚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
- 楼天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 应焕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 郑抑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 刘庭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 方晨宇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生
- 孙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 刘林漳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 甄 诚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 彭优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